



康定锅庄： 汉藏经济贸易与民族融合的载体

康定锅庄的起源与兴衰

“锅庄”通常被认为是由藏语“古咤”(skra-drag)音译而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含义有所不同。早期指土司下属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贵族和头人,随着汉藏民族贸易兴盛,锅庄的经济职能不断凸显,成为汉藏民族之间重要的商贸组织。根据《康定县图志》记载:“康熙三十九年,土司锡拉拉克被藏蕃昌侧集烈杀害,旋经四川提督唐希顺率兵征剿,以土司之妻贡嘎袭职其子坚赞德昌自木雅移此(康定)建垒营寨,置土目于此,听差侍贡,名锅庄”。康定早期的锅庄系统规模较小,仅有4家,但却是明正土司政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司制度下的头人、家臣、贵族等权力阶层作为锅庄主,承担着辅佐土司分担差务的重要职能。其中,接待来往汉藏使节朝贡觐见,并代为开展商业贸易便是一项重要任务,这也为康定锅庄日后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康定锅庄产业的快速发展源于汉藏茶叶贸易的兴盛。在清朝以前,汉藏贸易主要集中于大渡河以东的沈边、冷村等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皇帝批准“行打箭炉(康定)市,蕃人市茶贸易”,汉藏茶叶贸易市场逐渐由大渡河东岸向西岸转移,康定则取代沈边、冷村等地成为汉藏贸易的重要集镇,大量汉藏商贾云集于此集散茶叶等各类商品货物。在此背景下,康定锅庄的政治职能逐渐弱化,开始朝着专门面向汉藏贸易的经济实体结构进行转化,成为沟通汉藏民族贸易的重要枢纽。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定的锅庄系统规模发展至13家,到清中后期达到鼎盛,形成了48家锅庄的盛况,将汉藏民族的贸易往来编织进同一个贸易网络中。

清末,为进一步巩固边疆稳定,清政府实施改土归流,土司制度日渐衰微,康定锅庄也随即失去了可依附的政治体制。进入民国后,长期的政局动荡使汉藏贸易受阻,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政府又废除边茶引岸制度,康定在汉藏贸易中的地位与作用逐渐减弱,康定锅庄也进一步没落。新中国成立后,川藏之间交通运输条件得到有效改善,特别是在1954年,川藏公路全线贯通,使康定曾经在交通意义上的核心功能迅速消失,康定锅庄也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明清时期汉藏民族贸易的重要中介

康定锅庄是明清时期沟通汉藏贸易的重要桥梁。康定锅庄除了为交易双方提供食宿、存储等服务外,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构建了一套适应跨民族贸易需求的信任与沟通机制。在汉藏贸易往来中,汉族和藏族之间在语言、文化、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存

康定(旧称“打箭炉”)地处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自明清以来就是川藏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也是古代我国川茶销藏及汉藏民族贸易往来的核心集散地,吸引了众多汉藏商民云集于此。康定锅庄是伴随汉藏民族贸易兴盛而衍生出的一种地方性经济组织与文化空间,其融合旅店、货栈、贸易中介、衙门等功能于一身,在串联汉藏民族贸易,促进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冯钰伟



在差异,为了克服这些族际通商的障碍,康定锅庄作为中介组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经营锅庄的锅庄主,作为整个交易链中的核心人物,既通晓汉藏两地语言,又深谙汉藏两族的经商理念与文化习惯,同时又可敏锐洞察商品市场的行情,在交易过程中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锅庄主的牵线、介绍与担保,有效打破了汉藏民族之间因语言和文化存在的隔阂,弥合了因文化差异造成的通商壁垒,促成了双方交易的顺利完成。

康定锅庄是明清时期汉藏贸易交往的重要集散地。在建筑形态上,康定锅庄从早期“番民垒碉”式的多层结构,逐渐发展为融合汉藏特色的四合院风格,这种布局巧妙结合了汉式天井与藏式院坝,形成了独特的多元空间。锅庄的院落也是进行商品打包、分装、存储、交易等活动的场所,来自西藏的兽皮、金银、麝香、虫草、鹿茸等特产,与来自内地的茶叶、布匹、棉花、染料等物资在此汇聚和流转。这种活跃的商贸不仅满足了汉藏两边的需求,更直接带动了农牧业、缝茶业、制革业、运输业等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围绕锅庄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贸易体系。

康定锅庄是明清时期汉藏贸易协作的社会交往空间。参与贸易的交易者,既有贵族、使节、商贾,也广泛包含了社会底层的驮脚娃(背夫)、客夫子(伙计)、农牧民以及从事贸易的零散商贩。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人群在此频繁互动、协作交流,使康定锅庄超越了单纯的交易场所,成为既是汉藏物质文化交汇之节点,又成为建构汉藏民族乃至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文化融合共生的社会交往空间。

汉藏民族交融的重要载体

康定锅庄是汉藏民族相互尊重、团结友好的象征与纽带,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汉藏民族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构建了和谐发展、团结友爱的民族

关系。汉藏民族借助锅庄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外来的汉族商人不仅尊重藏族民众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更是以“入乡随俗”的智慧主动适应藏族社会,在语言、服饰、饮食等方面效仿藏族民众的生活方式,他们将商贸活动巧妙地融入藏族民众的社会生活与交往之中,获得了藏族民众的广泛认同。藏族民众则在相处中学习汉族语言与文化,吸收汉地商业理念。康定锅庄作为中介组织,主动进行双向调适,采用汉藏双名的方式成了汉藏民族文化互认、情感交融的媒介。例如,康定锅庄系统中最大的“瓦斯碉”锅庄取汉名为包家锅庄,“下必崇”锅庄称为汪家锅庄,“色根古”锅庄称为罗家锅庄,“甲人色”锅庄称为木家锅庄,等等。

康定锅庄还促进了汉藏民族间以通婚为载体的民族融合。据《西康之种族情形》记载,“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者,亦多娶夷女辅助”。清代至民国时期,为了稳固客源,康定锅庄构建了跨民族的姻亲关系,形成了以商人为主的汉族男丁入赘娶藏族妇女的汉藏通婚模式,俗称“坐锅庄”。此类跨族通婚兼具情感联结与商业协作的双重属性。首先,夫妻双方必须通过学习达到语言相通、情感相联的状态。其次,藏族妻子在掌握汉语后即成为兼通汉藏双语之人,可担任翻译促进交易完成。她们还因藏族身份更易获得参与贸易的藏族同胞信任,是贸易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桥梁。汉藏民族从生意伙伴转变为姻亲关系,子嗣承载两族血脉,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经济共生跃升至基因交融,为民族团结注入了血脉相连的韧性。

康定锅庄是汉藏民族经济交往的产物,也是汉藏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场域,生动体现了汉藏民族互动交流、互相接纳、互相借鉴的和谐关系。尽管康定锅庄最终因经济制度的变迁和社会需求的转变而逐渐消逝,但其所承载的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记忆却弥足珍贵。

据《学习时报》

周有光制定《汉语拼音方案》

1956年,语言学家周有光举家迁京,肩负重任:担任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化研究室主任,主持制定一套全新的汉语拼音方案。面对字母选择的争论,他力主使用拉丁字母,理由充分:简单易学、科技必需、利于交流,并定下三条核心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强调“要从世界看中国”。

方案制定就是场硬仗。周有光与叶籁士、陆志韦等专家反复打磨。档案里满是修改痕迹:1956年1月15日的“周有光修改稿”,1月17日叶籁士批示“请有光

同志修正后,立即打字分送”的稿子,甚至付排时周有光还说明:“原文还在改动,所以与最终发表的草案还不完全相同。”

1958年2月,全国人大正式批准《汉语拼音方案》成为国家法定方案。周有光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幽默地说:“有人笑我们笨,几个字母搞了3年。”但这只是起点。

1979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巴黎开会,专门讨论是否将《汉语拼音方案》确立为国际标准。重任再次落到周有光肩上。他曾回忆说:“领导忽然通知我下

周去巴黎。我说工作没完不想去。领导说不行,必须去。结果我揣着空口袋就上了飞机!”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为了汉语拼音的国际化,开始了长达3年的国际“征战”。

国际会议争论激烈。周有光据理力争,还专门撰写了《汉语拼音正词法要点》提交讨论。他凭借深厚的学识和坚定的信念,四处游说。终于在1982年,ISO正式通过决议,《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周星 据《人民政协报》